斯大林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及經濟科學

奧斯特洛維基諾夫著 俞旦初譯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馬列主義理論中的卓絕貢獻。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對包括經濟科學在內的一切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生產力、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律之原理。馬列主義理論因新的結論與原理而得到豐富；這種新的結論與原理，對一般經濟理論、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上升到最高階段，具有特殊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所作的馬列主義理論新原理的創造性成就，以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概念來武裝我們的黨，鼓舞全蘇人民為爭取共產主義而進行鬥爭。

* * *

斯大林在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一方面闡明了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同時又剖明了生產、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

斯大林同志指出，生產、生產力是社會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絕對條件。在這點上，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勞動工具、技術，同語言一樣，都對各階級表示一視同仁的態度，並能同樣地替社會的不同階級服務。

斯大林所揭露的生產與經濟基礎的區別，對政治經濟學有着極重要的意義。如所周知，在我們的經濟學文獻中曾經發生過生產與基礎的混同現象。這種理解的混同，產生了不正確的觀念，好像一個社會制度代替另一個社會制度，不僅必然會不可避免地消滅舊的基礎，而且也會不可避免地破壞生產力、生產。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由於革命的結果，

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並掌握着政權的任何新階級，全都利用舊的過時的生產方式遺留給它的生產力，首先是利用這種生產方式遺留給它的技術。

斯大林同志在暴露原始的對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觀點時寫道：

“有個時候在我國曾經有過‘馬克思主義者’斷言十月革命後在我國保留下來的鐵路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這樣的鐵路是不體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築新的‘無產階級’的鐵路。由此他們獲得了一個外號叫做‘穴居野人’”(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解放社版，第17—18頁。以下凡引用本書時均只註明頁數)。

獲得勝利的我國無產階級，不僅沒有破壞舊制度遺留下來的生產力，而且還使它替新制度服務。蘇維埃國家已經把生產力提高到許多倍，並使一切技術成就服從於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利益。

在一個社會制度替代另一個社會制度的過程中，消滅的不是生產，而只是舊的經濟基礎，以及適合於這種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定義，基礎是適合生產力發展一定水平的這個生產關係的總體。列寧曾經強調說，只有把作為主要的、基本的，制約着一切其他社會關係的生產關係、經濟關係區別開來，才能使社會的研究放在科學的基礎上。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發展着馬列主義關於基礎的原理時，曾經指出，基礎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

基礎與社會的生產力直接有關。生產力以及適合於它的生產關係構成這個社會的生產方式。

隨着社會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隨着勞動工具的變化和發展，社會的生產關係、經濟制度也就發生變化。反過來說，社會的經濟制度、基礎，是積極影響生產發展的力量；因為它能促進或阻滯生產力的發展。例如，建立了資本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英國的實業革命，便受到經濟因素所限制——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日益擴大的需求，與工廠和手工業生產狹隘技術基礎之間的矛盾。

在最初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曾經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初期，就對技術的進步設立了一定的界限。資產階級自私的、私有財產的利益、圖獲最大利潤的貪慾，阻滯着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階段，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變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資本主義的壟斷，人爲地阻滯着技術的發展，以便保持並增大獨佔的利潤。技術的發達完成得極不平衡，所以它的發展具有片面的特徵，而主要是針對着戰爭的方向。

與資本主義相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對生產力的發展，對技術的進步揭開了無限廣大的空間，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特徵。社會主義基礎對資本主義基礎的優越性，已在蘇聯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中明顯地表現出來。我們的國家只需十三年時間，便已完成了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最偉大飛躍。在這個難以置信的短促歷史期間，我們的祖國已經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和集體農莊強國。戰後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極大優越性的鮮明例證，它標誌着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走向前進的新的巨大步伐。

斯大林同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間相互關係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是馬列主義理論，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驚人貢獻。斯大林指出，生產力不是立刻的，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經濟基礎來制約社會的政治制度，它的思想、理論。

上層建築與生產沒有直接聯系。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斯大林同志說道：“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在生產中的各種改變的折光，通過在基礎中的各種改變來反映

的”（第八頁）。

斯大林同志在證明基礎對上層建築的一定作用後，同時又強調上層建築在基礎的鞏固與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斯大林同志指出，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第三頁）。

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社會主義的革命中。如果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在於資產階級的奪取政權，以便使政治的上層建築適合於尚在封建主義核心中所形成的新的資本主義的基礎，那麼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而使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只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開始而已。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代表的政治上層建築，是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的極偉大的積極力量。無產階級專政在其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革命改造活動中，依靠着過渡時期經濟中起着領導作用的社會主義制度。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設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同時，也就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建設了適合於社會主義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第二頁）。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上層建築對基礎、對它的組織和動員作用的積極影響大大增強。這說明了蘇維埃國家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把一切主要生產手段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爭取共產主義鬥爭中的主要武器。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證明了以生產手段的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各種經濟規律表示出它的作用，不是作為支配人類的自然力量，而是作為被黨與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所自覺地應用的可知力量。

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的生命基礎。如政治道德的一致、各民族間友誼以及蘇維埃愛國主義那樣的蘇維埃社會的動力，十足表示出對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對上層建築、它的組成要素、以及作為社

會現象之它的特徵，給予了全面的定義。

斯大林同志寫道：“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第一頁）。

政治經濟學也屬於上層建築範圍。它研究生產過程的社會方面、人類的社會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換句話說，是研究社會發展各個不同階段的社會基礎。

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生產關係與社會生產力的相互關係中的社會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證明，生產力的提高必將引起舊生產關係被新生產關係的革命替代，反過來說，生產關係也將給予生產力的發展以相反的影響，促進它或阻滯它。

政治經濟學也研究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經濟觀點、經濟學說的一定體系，適合於每個社會機構的經濟制度。

資產階級在反抗封建主義的鬥爭中建立了自己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這種政治經濟學在當初曾經起過進步作用，但是後來，隨着資本主義的鞏固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便完全成為資本主義的詭譎辯護者。現代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獨占資本的忠僕，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利益的代言人。它早與真正的科學沒有什麼共同之點了。

唯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是代表最進步的現代階級——無產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只有工人階級才關心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研究，因為這些規律的知識，對於為了擺脫資本主義的僱傭奴隸制而進行有效的革命鬥爭，為了爭取社會主義的建設而進行有效的革命鬥爭，它是有必要的。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利益處在不可協調的對立狀態，它們符合引導資本主義趨於滅亡和引導無產階級走向勝利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並完全適合全體進步人類的利益。

每個基礎都有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基礎起着服務的作用，並生存到它所產生的基礎存在時為止，這種情況，並不排斥歷史發展不同階段上的各個不同基礎所產生的社會思想之一定繼承性。

必需區別已經形成的基礎和上層建築，以及它們發生的過程。

資產階級在與封建主義作鬥爭時期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而資產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正是這種進步作用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利用了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遺產中的一切精華，並把它加以批判改造。

列寧寫道：“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在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形成的。亞丹·斯密（Адам Смит）和李嘉圖（Давид Рикардо）在研究經濟制度時，便已奠定了勞動價值理論的原理。馬克思繼承了他們的事業。他嚴密地建立並繼續發展了這個理論”（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五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意味着經濟科學中的革命轉變。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發生在資本主義的核心中；它是在推翻資本主義、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經濟發展上已經成熟的新要求之思想反映。

列寧和斯大林所進一步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社會的經濟發展規律及其在共產主義原則上的革命改造的深刻知識武裝着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

斯大林同志在其語言學著作中，研究了關於在社會主義勝利條件下的新的社會發展規律問題。斯大林同志指出，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突變的法則，對於分成兩個敵對階級的社會來說是必須的，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就完全不必須了。斯大林同志這個原理，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是意味着社會生活中的深刻質變。偉大共產主義工程的建設，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實現，造成了生產力的水平和供應之巨大質變。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實現着生產關係完全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法則，巨大的質變將不經過突變來完成，而是經過新質要素的逐漸累積和舊質要素的逐漸死亡來完成。這個過程，在蘇維埃國家全民積極參加下的自覺的計劃性指導制度中實現了。以馬列主義理論所武裝起來的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社會主義社會走向共產主義過程的計劃性發展的極大組織和領導力量。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同一社會機構的兩個階段。所以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以竭力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主要基礎的路線來實現。因此，過渡到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將要經過竭力發展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來實現；過渡到直接的物物交換，是以發展蘇維埃商業的路線來實現；過渡到直接按時計勞，可能以鞏固貨幣制度的路線來實現。

斯大林同志所發展的關於生產的決定作用、社會主義基礎在生產力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之馬克思主義原理，對正確認識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如我國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最低階段的建設時期，基本的任務會是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創造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一樣，現在在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建設時期，對首次計劃所提出的任務，是創造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是解決蘇聯經濟的基本問題。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生產總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然而在我們的經濟文獻中或在教育實踐中，時常遇到想把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的科學研究重心轉向分配問題方面去的企圖，並且這些問題是脫離物質技術前提來解決的。這樣的狹隘分配觀點與消費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對共產主義建設實踐有害的觀點。

在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分配問題絕對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這些問題不是基本的，而是派生的。這種保證消費品充足的生產力水平的達成，是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的基本條件。

對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所必須的前提，將按照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程度，按照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程度，經過工業品和農業品價格的逐步降低，經過這個基礎上工人與職員實際工資的提高和集體農莊莊員收入的增加而逐漸創造出來。

由此得出結論：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應該把自己的力量首先集中在有關創造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有關解決蘇聯基本經濟任務的問題之研究上。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能保證着最經濟和最合理的管理，能展開無限

的可能來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的生產。按照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程度，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知識、以及在共產主義建設實踐中利用它們的手段，獲得了更大的意義。在爭取計劃完成和超額完成鬥爭中的成就，愈益決定於每個企業的領導者，每個工程師和工人不僅掌握技術，而且掌握生產經濟到如何程度。所以，社會主義經濟迫切問題的科學研究和經濟知識的普遍宣傳——是蘇維埃經濟學家的最重要任務。

我們經濟科學的使命在於展開生產的後備力，總結社會主義競賽的經驗，研究國民經濟計劃、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實施工資按件計工和津貼制等的實踐。

在社會主義農業領域內，面臨經濟科學的任務，是總結提高收穫量和發展畜牧業的集體農莊的工作實踐，是總結組織上和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的工作實踐，是研究有關全面發展集體農莊社會經濟的問題。有關加強拖拉機站在發展集體農莊生產中的作用問題的科學研究，有關生產過程的複雜機械化及電氣化問題的科學研究，獲得了極重要的意義。

直接有關偉大共產主義建設及實現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是面臨蘇維埃經濟科學之創造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任務：研究偉大工程地區的經濟地理條件，研究這些工業區、農業區、特別是水利區的發展前途，建立運輸網，解決勞動來源和新生產力供應問題。

經濟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工作者，首先是與進步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的密切聯系和合作，是順利完成上述任務的決定條件。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工作者的創造性合作，以先進實踐的經驗豐富着科學，以理論上的結論和總結武裝着實踐。

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是經濟科學發展中的卓越貢獻，它動員經濟學家去作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去創造地研究迫切的經濟問題，去組織科學上的討論，去展開科學工作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斯大林天才著作所武裝起來的蘇維埃經濟科學工作者，正在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來解決由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共產主義建設事業所提出的任務。

（譯自真理報1951年6月27日）